

一个大国,一个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国家,都有拿得出手的读本。美国有美国读本,法国有法国读本,德国有德国读本,一个国家有了拿得出手的读本,把自己的精神、文化内核,准确地用通俗的方法表达出来,说明这个国家文化的成熟和自信。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魂,是中华民族屹立不倒、蒸蒸日上精神内核。把“中国读本”和“中国精神”结合起来,就诞生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部恢弘的著作——《中国精神读本》。

这是一部汇聚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正气的图书。从题材上来说,它集结了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这140多年间,中国近现代史上百余位风云人物的心血之作,其中包括孙中山、梁启超、鲁迅、毛泽东、邓小平,等等。他们书写爱国情怀,表达崇高的革命理想,情感饱满,演奏出了时代最强音。多少艰难的抉择都凝结在这一篇篇的佳作中,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以及独特的精神底蕴,让人受益匪浅,是一本值得全民熟读的精神读本。

9月1日,该书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新书发布会。现场我们感受到的是,八旬“老人”主编王蒙对这部作品慷慨激昂的推荐;身兼企业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的总策划人沙烨对这部作品的拳拳赤子心;清华大学教授王绍光领衔的学界编委会的严谨与专业;陈一丹(腾讯集团主要创始人)、程维(滴滴出行创始人)、杨浩涌(车好多集团创始人)等众多新经济企业家代表的社会责任感和热血。

传统与跨界的出版尝试

《中国精神读本》不光有厚重的精神内涵,而且它的出版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它是由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参股的果麦文化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共同策划的。2018年年底,果麦内部组建了选题委员会,由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担任组长,坚持把社会效益作为第一责任,《中国精神读本》的选题策划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这不仅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和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是国有出版社和民营出版公司在资本和内容两方面战略协作的典范。

《中国精神读本》不是个单纯的封闭项目,策划方邀请了众多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们共同参与。它集合



《中国精神读本》跨界出版记：今天为什么需要阐释“中国精神”？

■何雯

了强大的社会力量——陈一丹基金会、滴滴出行董事长程维、威马汽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沈晖、阿里巴巴集团组织发展顾问王文明、搜狗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小川、车好多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杨浩涌、哈啰出行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杨磊等等,他们都是成功的企业家,在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也把推广、弘扬中华精神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还纷纷订购了大批的《中国精神读本》,作为企业员工的阅读书单,进一步扩大了本书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策划出版全流程

作为献礼新中国70周年的作品,《中国精神读本》不仅是诚意之作,也是厚重之作。为了它能够在十一国庆节之前顺利出版,策划人、编委会以及出版机构的工作人员付出了数百天的辛勤工作。

浙江文艺和果麦文化在什么样的原因和契机下合作推出了《中国精神读本》,在策划和编辑过程当

中,有什么样的事情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本书为什么能让文化界、商界等不同领域的名人协力推荐?

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邱建表示,浙江出版集团投资果麦,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对接具体的合作。两家合作单位共同组建了社会效益选题委员会,由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担任社会效益委员会主任,在国有出版社跟民营公司的合作里可能是首创。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路金波介绍说,一开始总策划沙烨找到他,他再找郑重。他们三个年龄相仿,沙烨从事投资工作,路金波介于媒体和商业之间,郑重则是体制内的青年干部,“我们策划这本书的痛点来自哪呢?就是中国人特别爱吵架,连粽子是甜的还是咸的好都要吵一架。我们想,能不能向古人学习,呈现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呢?于是,我们把过去的历史文献找一遍,取最大公约数,取出来是两个主题,第一个是爱国,第二个是叫改革”。

在路金波看来,中国人的爱国情怀是溶解在基因里的,不论是哪

个派别,什么时候的思想家、学者、革命家,谁要是背弃了民族和国家,谁就是民族的罪人。所以,中华文明才成为了世界几大古老文明里面唯一一个没有间断的文明。至于改革,是因为确实日子过不下去了,不变的日子过到头了,所以救亡、困存,总之一要变化。这个变化的精神也是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的,一直到今天,我们称为“改革精神”。

于是,编委会从8000篇里取2000篇,2000篇里取400篇,400篇里最终取100多篇,主线就是这样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编委会特别强调选文的文学性,一定要好读,作为大众出版,如果不读,读者不看,做再庞大的工程,也失去了对读者的影响力。

果麦文化总裁翟洪斌补充了一个细节。在两家图书出版机构合作过程中,几乎都是把“老大”当小兵来使。总策划沙烨看过每一篇文章,再和王绍光教授逐篇讨论,并且本书的前言也是他亲自撰写的。

其次,《中国精神读本》涉及诸多的版权问题,要找到作者本人,或

者找到作者的亲属,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整本作品的版权落实问题由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亲自主导,逐个打电话、发邮箱、寄信等,才把版权全部落实。

翟洪斌这些年在公司里主要是做管理工作,具体的编辑工作已经很少做了,但是为了这本书,他也是和编辑一起打磨,不管是封面、字号、字体、颜色,活动背景板用这张图还是用另外一张图,广告文案用这一句还是那一句,都亲力亲为。

提到《中国精神读本》的出版,翟洪斌数次提到一个人,沙烨。他说,此书能够出版的最大功臣之一,是总策划沙烨先生。由于他的发起,才有了这个振奋人心的出版工程。

沙烨如是和记者阐述当时的策划初衷:“我家的书架上曾经放满英文著作、西方名篇。当我回望父辈们经历过的那个时代,才发现手边材料寥寥可数。从去年五月开始,我们启动本书的编写工作,编写过程历时一年有余。”

他进一步补充道:“我们共同属于一个古老的文明,这个文明拥有绚丽的文化和辉煌的历史。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曾百家争鸣,我们有唐宋盛世,我们能远征西洋。我们曾经分裂,但总能回归统一。我们曾被异族侵略,但文化却融合而愈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这精神将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让我们在新的征途中继续创造历史。”

《中国精神读本》收录了从甲午战争至改革开放,一百多名政治家、文学家、革命家、诗人的代表作。该书用第一手的文字,显现人物的思想,还原历史的真实。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这些作品都曾经影响了时代,照耀了历史的天空,很多篇目至今仍是我们的前行的指明灯。

诠释中国精神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邹书林认为,以时间为序,每年选两到三篇名篇,是很难的事情,因为近现代以来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编选的难度很大,必须把文献的知识、线索、脉络吃透才行。把最值得大家记住的,最闪光的,最能代表作者思想,文化精髓,气魄的(选篇)做出来,编委会确实很花了一番功夫。

“《中国精神读本》的编选,出版体现了中国精神,选本反映了选家的品位、学识和眼光。”翟裕基金

理董事长翟震宁表示,编辑家在古代叫选家,会选书的人是很了不起的。在中国古代,比一般学者学问要高的,才是选家,才能到翰林院做编修。用这个眼光来审度,《中国精神读本》体现了独具慧眼的选家思维。在翟震宁看来,中国精神具有理想高远、紧贴实际、科学理性、人文关怀等鲜明特点,具有刚柔相济、自强不息的意志品质,具有持续不断的创新与转化的精神,以及卓越的包容性等。此书选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精神的特点和内涵。

主编王蒙先生更是对自己的“孩子”赞不绝口。老爷子年过八旬,但是在人民大会堂新书发布会的现场精神矍铄,步履矫健,发言慷慨激昂,引得场下观众忍不住鼓掌以示敬意。

王蒙说:“我们越来越关心文化,我们谈文化自信,谈传统文化,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提纲挈领的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呢?现在有很多节目都深受欢迎,《舌尖上的中国》是食文化,《诗词大会》是诗词竞赛,都做得非常的成功。但我们能不能够把它们概括一下,能不能够把它们综合一下,能不能够抓住中国精神?这可能个大题目。”

王蒙回忆,原来赵启正同志跟他说过,赵启正和一批教授到国外去讲中国文化,一个外国人提出来了,说是整天听到你们中国人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可否请你们概括讲一讲,是怎么个博大精深法?所以编这么一本书,是大家急需的一件事情。

在王蒙看来,中国精神从《周易》说起可以,从《论语》说可以,从《道德经》说也可以,从宋明理学、新儒学说,也是一条线索。他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精神是一种拒绝西方式的“森林法则”的精神,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圣贤的精神,是奉献的精神,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在近现代这一批思想家、文学家、大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文化的精神,士大夫的精神,君子的精神,救亡的精神,救国的精神,也有追求现代化的精神。

“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在此之际出版《中国精神读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历史上,中国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以不怕远征难的信念不断前行。今天,我们仍需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朝气蓬勃迈向旧貌换新颜的明天!”这是王蒙最后的结语。

明代的游览名胜区有着浓郁的艺术氛围,旅游人在游览中又可以欣赏到高水平的歌舞,优美的音乐演奏。如此尽善尽美的旅游文化,使旅游诗人都感到“相见恨晚”,自觉“才浅”。

文化与旅游融合时,勿忘向古人取经

2018年4月,新组建的文化与旅游部正式挂牌。意味着一个政府部门将统管文化和旅游两种事务。当然,这首先是体现了政府精简机构职责整合的改革举措。但是,其意义不可小觑。有评论说:旅游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而文化具备的亲和力与凝聚力让旅游变得更有认同感和获得感。很显然,文化和旅游的成功融合,便使文化获得新发展的同时,促进了旅游品质“质”与“量”的新提升。

文化与旅游历来亲密,文化的理想经常通过旅游来表达;旅游本身也就是一种文化,也可以说旅游是文化的一种独特的审美形式,文化的思想和精神是在于旅游的时空中充分体现的,这是一种天性。文学中最先进入旅游文化的,恐怕要算诗与词了。尤其是中国,汉语方块字,字形字意都能完美透彻地表达旅游人的思想情感。甚至影响到旅游景点的产生和发展。

旅游中审美对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的,它是宇宙的赏赐人类的建造;另一类是人文的,这是人类灵魂的倾诉。自然的、人文的都是文化,并且二者是相融的。自古以来,无数的智士贤人热心为旅游文化的发展效力,更有甚者为之殚精竭虑,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明朝学者潘之恒就是其一。

潘之恒(1556—1622)字景升,号鸢嘴生、天都逸史、冰华生。安徽黄山脚下歙县岩寺人(岩寺,现属黄山市徽州区),祖父潘儒是个盐商,徽商具有着“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的特点,潘之恒的祖父很有文化修养,五十八岁中举人,官至福建汀州府通判,父亲潘召南,也是个读书人,未参加科举考试,一生营商。

潘之恒受家庭熏陶,从小喜爱读书、作文、写诗。曾做过国子监生,科举失败后就放弃了追求仕途

而沉溺于文化。由于家庭在外经商,因此,他得以四下周游,足遍齐鲁燕赵,阅尽名山大川。同时,又酷爱戏曲,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写诗撰文、组织戏曲演出和评论、引领商人、艺人、写家游览名胜的同时,观看名优表演,聆听曲家弹唱。如此强大的社会活动能力,令人仰慕。

纵观潘之恒的一生,他虽然扮演过各种角色,但是,其角色表演行动主要还是在旅游——这一庞大的时空舞台上。他的文化在游山玩水过程中展现,他的才识饱蘸着天南海北的山水情。这位使多种文化旅游形式与旅游相融合,一坐于潜生于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徽州奇人,古今少有。今天,当我们研讨文化与旅游相融合时,反观潘之恒,体味他的文化意识,同时联系古今实际,来探讨文化与旅游融合的问题,应当说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游览,就一般性的活动,是每一个人想做到而可以做的事。但在游览过程中和游览之后,对于景观的评价和感想,一般人都是触景生情即兴表达。说景、议景、唱景、摄影,总是围绕景本身。然而,文学家,尤其是诗人,游览中特别喜欢节外生枝,“说景”似乎只作个开场白,用心之处在于直抒胸臆,把内心深处由景生发的想象,情景交融的感悟惟妙惟肖地描绘在诗词和散文中。还有这样一些诗人,他们的旅游诗并不在说景,或通过说景写人或直写人,以对景中之人的描述评价,传递诗人的情感意愿,这是一些“以人本”的旅游诗人。潘之恒就是。

潘之恒的诗作《游楞伽山》:移樟出横塘,悠然见上方。天从湖尾隔,山带树容苍。客病消茶碗,禅心醒石床。翻岭台畔草,尽作蕊台香。楞伽山是苏州的名胜古迹,本名上方山,因山与佛有缘,固从佛教《楞伽经》意得此名。是南宋名臣、

大诗人范成大的故乡仙境,范成大曾写有七言绝句《横塘》,表达在故里送客心情。《横塘》诗曰:“南浦春来绿一川,石桥朱塔两依然。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系画船。”

两位诗人笔下的“横塘”乃是楞伽山的古渡通衢,大诗人范成大的七绝《横塘》为世间奉献了一幅江南特色的诗情画卷。诗句“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系画船”被奉为经典佳句脍炙人口。地名“横塘”,也因此成为古代一种“送别”礼仪的代名词。400年后的潘之恒对于先辈大家的七言绝句自然是顶礼膜拜,《游楞伽山》的首句直书“横塘”溢于言表。但是,潘之恒的诗作《游楞伽山》的妙处在于不停留在说景上,而在于另辟新境——说人。

“客病消茶碗,禅心醒石床”,反映的是病人跋山涉水来名胜求佛寻医问药的情景。医僧把步入禅室的患者视为客人,安抚入座奉茶问诊,细访脉息,每每药到病除起死回生,患者心悦诚服感恩戴德。虽然佛医只是小乘,只能度化少数人脱离苦难病缠,但是治病救人确是一种积德行善而令人尊敬。“翻岭台畔草,尽作蕊台香”的两句,则是潘之恒以自己诗人特有的“以小见大”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称赞。他把时光放在积德的医僧和佛家弟子看做台畔草,然而这些不起眼的野草,却散发着蕊台的芳香,蕊台是西域雪山的香草,佛家常比喻为出家佛门弟子的芬芳品德。

“天下名山僧占多”,名山名佛藏名医。自然不一定是佛教,道教也有道医,并且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杰出的医学学家药学家,如闻名遐迩的《黄帝内经》就出自唐代的黄老道家,后人称作药王的孙思邈之手。积我国16世纪之前药学成就之大成,被国外学者誉为中国之“百科全书”的《本草纲目》,是明代道家子弟李时珍的著作。无论是佛医还是道医,都是极为珍贵的中国传统中

医学,这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半壁江山。潘之恒的旅游诗独具慧眼,在无以计数的旅游者不太在意的针灸灸脉上发见良知。这里有丰富的人文信息,旅游空间理当珍惜。

潘之恒多才多艺,但他首先是位戏曲家,家有戏班子,外有戏友团。他的戏友圈可了不得。老乡中有师长辈的国学大师汪道昆(1525—1593),赣有“无梦到徽州”拥有扛鼎之作“临川四梦”的昆曲巨匠汤显祖(1550—1616),苏有“词才乐才两全高手”的昆曲改革大家梁辰鱼(1521—1594),至于名优名票不计其数。确是一位海内多知己的大人物。

他爱看戏,戏看了还在琢磨,写了一摞评论和艺人看客书神聊,或筹办研讨会或会见相关人士谈戏。因为他酷爱旅游,是一位旅行家,所以他经常把这类戏剧活动安排到旅游景点上。边游玩赏景边看戏品戏,兴奋之余,便有一篇篇诗稿流出。

“梨园处处按新词,桃叶家家度翠眉。一自流传江左调,令人却忆大朝时”“白下逢梁伯龙感旧二首”“板桥南岸柳如丝,柳下谁家将叛儿。《白芒》尚能调魏谱,红牙原是按梁词。雨填山翠通城染,潮没堤痕去路疑。年少近来无此曲,旧游零落使人悲。”《昆山听杨生曲有赠》

潘之恒的这两首诗,反映了昆曲的创兴与改革:明嘉隆年间,魏良辅对昆山腔进行改革,创立悦耳动听听的“新声”风靡大江南北。但“新声”只是清唱,梁伯龙继承和发展了魏良辅的成果,领“新声”走进舞台歌舞传奇,扩大了“新声”的表现力,使得“梨园处处按新词”,赢得了“子弟喜歌之”。至此,一个新声戏曲剧种——“昆曲”诞生。梁伯龙不仅使“新声”走进舞台,而且用“新声”谱写歌曲,梁伯龙自己

的散曲集《江左白芒》全配了昆腔演唱并且广泛流行,人们乐称这种“流行”为《白芒谱》,“《白芒》尚能调魏谱,红牙原是按梁词”的诗句概括了这番成果。昆曲是中国戏曲之母,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粉丝可观,研究者众。爱屋及乌,它的根据地昆山和金陵,势必为热爱昆曲人们所向往。与昆曲相关的物质环境自然成为旅游热点。

潘之恒与梁伯龙(梁辰鱼)在南京会面,两位戏曲大家是边观景边谈天,但谈话的内容并非家长里短而是发生在当时的昆曲变革,影响一个剧种未来发展的主题。这首诗得以流传就在于观景的感受与谈话的情绪融合。

潘之恒游记的传世名篇《秦淮看月记》,在旅游类的诗文中,是屈指可数的一篇长文,要紧处在“匠青溪夹岸竟传吴音,而图中以真情胜者,则元女之珠献彩女之箫,随其孤排排旅游景点上。边游玩赏景边看戏品戏,兴奋之余,便有一篇篇诗稿流出。

“梨园处处按新词,桃叶家家度翠眉。一自流传江左调,令人却忆大朝时”“白下逢梁伯龙感旧二首”“板桥南岸柳如丝,柳下谁家将叛儿。《白芒》尚能调魏谱,红牙原是按梁词。雨填山翠通城染,潮没堤痕去路疑。年少近来无此曲,旧游零落使人悲。”《昆山听杨生曲有赠》

非常明显,游览与演艺的结合古来有之,二者是互补的。我们从潘之恒的游记《秦淮看月记》中可以得知,明朝的游览胜地少不了演艺娱乐。《游记》把苏州虎丘和金陵秦淮的中秋之夜作了比较,两地中秋都是皓月当空月色如昼,一样的充满诗情。但是“时善音者皆集金陵,子夜闻之靡靡耳”。两处的差别就在于此。虎丘的演艺和秦淮的演艺相比有所逊色。因为秦淮游览区的“是善者”即“有才华的演艺人员”,云集于金陵,高手以“奇绝”的技艺抒发“真情”打动游客。因此,便呈现出“笙箫韵动秦淮月,令人赏玩情绪大增”的效果。

■程功思

词,词典解释说: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供远眺、游憩、藏书、供佛之用的楼台”。《秦淮看月记》中描写的阁,自然是供游憩之用的演艺楼台,通常游览区除了阁之外,还会设置室内或露天表演的舞台。游览区这类游憩建筑的设置,可以说就是旅游与演艺融合的体现。旅游是一种动态行为。在游览区游玩、参观必然消耗体力。而观看表演,是一种顺势自然的歇息,无需体力消耗,而且通过观看表演产生乐趣,放松了紧张的情绪和调整了内外节奏,消减了疲乏。同时,游览区的表演内容一般是娱乐性的,优秀的有品位的娱乐性节目蕴含着“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地精神输氧也可以使休闲文化更高尚更健康。

旅游是一种文化,它展示的内容主要是自然景观人文古迹,但是,它的包容性很强,能将许多精神性的非物质性存在纳入其中,特别是艺术表演和展览,在功能上与前两者一样,都是提供旅游者观赏。游览和娱乐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综合文化。是见识与休闲的融汇。品味就摆在融合中体现。当人们选择游览环境时,在考虑经济、交通、起居、饮食外,自然会从文化上考虑与选择。

潘之恒在《秦淮看月记》中,被秦淮的艺术真情深深打动,海见之晚,恨学识浅,未能收益满满。

潘之恒一生爱旅游,并且在旅游中不停笔,是一位“走一路写一路”的旅游诗人,除了诗,还有专著,第一部《黄山志》就出自他的笔下。他同时又是一位戏剧评论家,著名的《以名士训其义,继以词士合其词,复以通士标其式》的《演习三部曲》,就是这位行家的真知灼见,这对于戏班的排演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本文为作者为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副院长)